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ПОВЕСТЬ О ЖИЗНИ

一生的故事

第二部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ПОВЕСТЬ О ЖИЗНИ

一生的故事

第二部

[俄]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非 琴 译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生的故事 / (俄罗斯) 帕乌斯托夫斯基著; 非琴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7.10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ISBN 978-7-5545-3673-5

I. ①一… II. ①帕… ②非…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4398号

非琴俄罗斯文学经典译文集

一生的故事

作者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俄罗斯)

译者 非 琴

策 划 杨 才 蒋海燕

责任编辑 蒋海燕 郝建国 霍雅楠

石 姮 程亚星

装帧设计 于 越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56.75

字 数 1336千字

版 次 2017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3673-5

定 价 218.00元 (全6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此处未住人”	1
空前未有的秋天	7
铜线	17
忽视战争	29
带着一张100卢布票子的老头儿	37
列福尔托沃区之夜	45
卫生员	50
冰雪覆盖的俄罗斯	58
司号兵和碎纸	66

喀尔巴阡山山前地带的雨	73
烟笼雾锁的桑河对岸	85
维普希河上的春天	92
大骗子	99
“葡萄牙”号远洋轮船	111
在被破坏的道路上	133
小骑士	138
两千册	153
科布林镇	160
背叛	166
在沼泽地的树林里	169
在幸运的星辰下	178
斗犬	197
潮湿泥泞的冬天	204
悲哀的忙乱	215

切列夫卡郊区	225
仅仅一天	236
“大不列颠” 旅馆	249
谈谈笔记和记忆	264
粉刷农舍的艺术	284
潮湿的二月	297

“此处未住人”

吉利亚罗夫教授的房门上钉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此处未住人”。

吉利亚罗夫给基辅大学的学生讲授哲学史。他满头白发，不刮脸，穿一件肥大而有光泽的毛料西装上衣，上面撒满烟灰。他匆匆登上讲台，用青筋毕露的双手紧紧抓住讲台的边缘，讲了起来——声音喑哑，听不大清楚，好像他讲课是不乐意的。

教室窗外，基辅的花园里金光灿灿，仿佛笼罩着一片无论如何也不会熄灭的金色火焰。

基辅的秋天总是过得很慢。南方的夏天在城市花园里积蓄了那么多太阳的热量、绿荫和花香，因此，它舍不得与这些财富分离，给秋天让位。夏天几乎每年都要干涉大自然的时间表，拖延着不肯离去。

只要吉利亚罗夫一开始讲课，我们这些大学生就已经不注意周围的任何事物了。我们全神贯注地谛听教授含糊不清的低语，人类思想的奇迹像魔法那样迷住了我们。吉利亚罗夫不慌不忙，几乎是气冲冲地在我们面前揭示出人类思想的秘密。一个个伟大的时代相互间都有着内在联系。我们始终有这样一种感觉：人类思想的洪流是不可分割的，几乎不可能彻底弄清，哲学到何处为止，诗从何处开始，诗又是在什么地方渐渐转变为日常生活的。

有时，吉利亚罗夫从鼓鼓囊囊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本诗集，封面上印着一只鸱鸒——智慧之鸟，断断续续地读上几行，用来证明他那哲学家的言论：

……如果今天我们的太阳
忘记走完自己的路程——
明天某个狂人的思想
定会使全世界大放光明。^①

有时，吉利亚罗夫脸颊上很硬的胡子会竖立起来，眯缝着的眼睛也在发笑。这是当吉利亚罗夫给我们讲认识自我的时候。听过这篇讲演之后，我对人类认识的无限力量产生了信心。

吉利亚罗夫简直是对我们大喊大叫。他命令我们不要葬送我们的希望。应当孜孜不倦，力求进步，竭力取得你身上所有的一切。一个有经验的乐队指挥就是像这样发现乐队里的所有声音，迫使最固执的乐队队员充分发挥任何一种乐器的表现力。

“人，”吉利亚罗夫说，“应当认识、丰富和美化生活。”

理想主义已日趋没落，因此，吉利亚罗夫的理想主义染上了一层为此感到痛苦和经常惋惜的色彩。在吉利亚罗夫的许多论述中，我记住了他谈论“理想主义最后的晚霞，以及它临终的信念”的一些话。

在这位外貌好似埃米尔·左拉的老教授身上，充满了对当时一切平安

① 引自法国诗人皮埃尔·让·贝朗瑞（1780—1857）的诗《狂人》。

顺遂的庸人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蔑视。

这和他们上的铜牌所表示的观点完全一致——人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当然明白，吉利亚罗夫所以要挂这块铜牌，是故意要惹他那些体面的邻居生气。

吉利亚罗夫经常说，人要使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不久，我得出结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中最充分地表现自己。但怎样表现？用什么来表现呢？我认为，最正确的途径就是从事写作。于是，产生了从事写作的想法，仿佛这就是我唯一的生活道路。

从那时起，开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它经常是困难的，欢乐的时候却较为少见，但总是动荡不安，而且是那样丰富多彩，以至回想起这段生活时，很容易把头绪弄乱。

我的青年时期始于中学的最后几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它也就结束了。也许，青年时期的结束比正常情况早了些。然而，有那么多战争、重大的转变、考验、希望、困难和欢乐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一切足以抵得上我们祖先几代人的经历。

在相当于木星绕太阳运行1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仅仅回忆起这一切，我们的心都会揪紧起来。我们的后辈当然会羡慕我们这些曾亲自参加并目击人类命运中许多伟大转变的人。

大学是城市里进步思想的中心。起初，我和大多数新生一样，在大学里十分腼腆。遇到老生，特别是遇到那些“终身大学生”时，会感到惊慌失措。这些留着大胡子、穿着不扣纽扣的破旧制服上衣的人，好像把我们这些一年级的学生看作是没有理性的小狗崽。

除此而外，离开中学之后，对有些情况，很久我还不能习惯——听课完全不是非去不可。大学里正在上课的时候，可以不受惩罚地坐在家看书，或者在城里闲逛。

渐渐地我对大学感到习惯了，而且很喜欢它。但我喜欢的不是讲课和教授（有才能的教授并不多），而是喜欢大学生生活的性质。

教室里在正常上课，但犹如暴风骤雨一般、十分吵闹的大学生生活在大学昏暗的长走廊里也很正常，这种生活是不以讲课为转移的。

在这些走廊里，整天都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各种群众大会吵吵嚷嚷，各种同乡会和党派都在这里聚会。走廊淹没在烟草的烟雾里。

我第一次得知，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孟什维克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第一次听说有什么崩得分子^①、达什纳克党人^②、“真正的”乌克兰人，以及“帕奥利亚·齐昂”的党。但有时所有这些党派的代表人物也会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共同敌人——“阔少爷派大学生”。黑帮学院联合会的成员们和“阔少爷派大学生”的争吵常常会变成打架，特别是当“高加索同乡会”参加进来的时候。

在这激情的沸腾中已经可以感觉到，某一新时代已经临近了。但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就在这里，几步之外，在教室门里面，一些白发苍苍的、可敬的教授正在令人有点儿烦闷的寂静中，讲什么汉萨同盟^③各城市的贸

① 崩得是“立陶宛、波兰、俄罗斯犹太工人总同盟”的简称，主张民族文化自治，支持孟什维克的立场。——译者

② 达什纳克党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译者

③ 14世纪至17世纪以吕贝克市为首的德国北部城市间的商业政治联盟。

易惯例，或比较语言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里，有许多人已经预感到大雷雨正在迫近，但是不能预见到雷雨会以怎么样的威力降落到大地上。正像大雷雨之前一样，俄国和世界都感到闷热不堪。但还没传来雷声，这使许多没有远见的人觉得放心。

工厂罢工时，基辅郊区清晨的烟雾中令人惊惶不安的汽笛声，逮捕和流放，无数的传单——这一切都是远方大雷雨的闪光。只有敏锐的听觉才能隐约听到这闪光后隆隆的雷声。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914年夏天那震耳欲聋的第一声雷鸣，使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

我们这些中学生离开中学以后，彼此立刻失去了联系，尽管我们曾经发誓永远不要失去联系。战争爆发了，后来又发生了革命，从那以后我几乎再没遇到过我那些同学中的任何人。快活的斯坦尼舍夫斯基，不太高明的哲学家菲佐夫斯基，为人审慎的什穆克列尔，行动迟缓的马图谢维奇和动作迅速、犹如飞鸟的布尔加科夫，都不知下落，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独自一个人住在基辅。妈妈和姐姐加莉娅、哥哥季马——工学院的学生——住在莫斯科。大哥鲍里亚虽然也住在基辅，可是我和他几乎见不着面。

鲍里亚和一个身材矮小、体形丰满的女人结了婚。她穿一件绣着仙鹤的紫色日本和服。鲍里亚天天都待在屋里画混凝土桥梁的图纸。他的屋里糊着仿橡木纹理的糊墙纸，光线昏暗，散发着一股发蜡味。脚老是会粘在油漆过的地板上。墙上用生锈的图钉钉着全世界的美人儿林娜·卡瓦莉耶丽的几张照片。

鲍里亚不赞成我醉心于哲学和文学。“应当在生活中开辟出一条道路

来。”他说，“你是个幻想家，和爸爸一样。给人消愁解闷，这不是一件正经事。”

他认为文学就是给人消愁解闷。我不想和他争论。我想保护自己对文学的深厚感情，使它不受恶意的目光伤害。因此，我不再到鲍里亚那里去了。

我住在外祖母那儿，住在绿荫如盖的基辅郊区、卢基扬诺夫卡花园深处的厢房里。我住的那间屋里摆满了一盆盆倒挂金钟。我只是在看书，一直看到十分疲倦的时候。为了稍微喘一口气，每天晚上我都到花园里去。花园里秋天的空气已有寒意，树叶凋零的树枝上方星空闪烁。

起初，外祖母很生气，硬要叫我回屋里去。但后来习惯了，也就随我去了。她只是说，我是在毫无“先斯”^①地，换句话说，也就是毫无意义地虚度时光。这一切的结果，必然是要害百日癆。

但外祖母对我的新朋友们可有什么办法呢？外祖母怎么能反对普希金或海涅，费特或勒孔特·德·李勒，狄更斯或莱蒙托夫呢？

最后，外祖母根本不来管我了。她在自己屋里开了灯，灯上罩着个形状像一朵大郁金香的粉红色玻璃灯罩，专心致志地在看克拉舍夫斯基那些长得没完没了的波兰长篇小说。而我却想起这样的诗句：“犹如亲切的召唤，星星的金色睫毛在颤动，若隐若现。”于是，我好像觉得，大地就是一座宝库，里面保藏着许多像这些星星的金色睫毛一样的宝物。我相信，生活为我准备了许多迷人的事物、会见、爱情和悲哀、欢乐和动荡，我青年时期的伟大幸福就包含在这一预感之中。未来将证明，它是否会成为现实。

① 波兰语“意义”的音译。

而现在，正像一些古老的戏剧里那样，演出之前，演员们先走到观众面前，说：“我们将为你们演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事件，并尽力迫使你们好好地思考一下，痛哭一阵，大笑一场。”

空前未有的秋天

我乘火车从基辅去莫斯科，坐在列车上安放供暖设备的一间狭小的车厢里。总共只有3个乘客——一个上了年纪的土地测量员，一个包着奥伦堡白头巾的年轻妇女和我。

那位妇女坐在一个冰冷的小生铁炉子上，我和土地测量员轮流坐在地板上——两个人一起坐，坐不下。

碎煤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由于这些碎煤，那位妇女的白头巾很快就变成了灰色的。紧紧钉死的车窗外什么都看不清——车窗也是灰的，玻璃上满都是已经干掉的雨滴痕迹。只是在苏希尼奇附近，我看到并记住了一大片血红的晚霞，晚霞染红了整个天空。

土地测量员看了看晚霞，说边界那里大概已经在和德国人作战了。那女人把头巾紧紧捂在脸上，哭了起来。她是到特维尔去看丈夫的，不知道是不是还能在那儿见到他，还是已经把他派到前沿阵地去了。

我去莫斯科与哥哥季马告别，他也被应征入伍了。我因为近视得厉害，所以不要我参军。除此而外，我还是家里的小儿子，而且是大学生。根据当时的法律，最小的儿子和大学生都免服兵役。

要从供暖设备间走到车厢门口的平台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被动员

入伍的人就这样随随便便地躺在车厢顶上，吊在缓冲器和扶梯磴上。一个个车站用妇女们拖长声音的号哭、手风琴的吼叫、口哨和歌曲来迎接我们。列车一停下来，立刻就好像在钢轨上扎了根。只有用两台机车才拉得动它——就是两台机车，也得用力猛地一拉才拉得动。

俄罗斯动起来了。战争好似地下的震动，迫使它猛然离开了自己的基础。千万个村庄里响起惊惶不安的钟声，宣布动员。成千上万匹农民的马从全国最偏僻的角落把新兵送到铁路线上。敌人从西方入侵我们的国家，但强大的人流犹如波涛一般，从东方迎着敌人滚滚流去。

全国变成了一座兵营，生活乱作一团。习以为常和固定不变的一切，转瞬间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去莫斯科的漫长旅途中，我们3个人总共只吃了一个硬得像石头一样、嵌葡萄干的小白面包，喝了一瓶混浊的水。

大概正是因此，早晨我从车厢里走到布良斯克车站潮湿的月台上的时候，我觉得，莫斯科的空气芳香扑鼻，让人感到轻快。1914年的夏天——那个可怕的、令人忧虑的战争的夏天即将结束，莫斯科的空气里已经可以闻到有点儿甜蜜蜜的、凉爽的秋天气息——枯叶和静止不动的池塘的气味。

那时候，妈妈恰好住在莫斯科大普列斯尼亚区一个这样的池塘附近。住房的窗子朝着动物园，可以看到普列斯尼亚区许多房屋的红砖防火墙。还在1905年十二月起义时，这些防火墙就已经被炮弹打坏了。还能看到动物园里荒凉无人的几条小路和一个大池塘，池塘里有一池黑水。在一缕缕阳光照射下，池水闪现出水藻的淡绿色。

我从来还没见过一所住房像妈妈在普列斯尼亚的住房这样，与人们的

性格及其生活如此协调一致。屋里空荡荡的，几乎没有家具，如果不算厨房里的桌子和几把会吱嘎吱嘎作响的维也纳式椅子的话。几棵发黑的老树的阴影落到屋里，因此住房里总是昏暗的、寒冷的。桌子上发黏的灰色漆布也是冷冰冰的。

妈妈仿佛对漆布产生了特殊癖好。漆布取代了从前的桌布，并执拗地向人提醒生活的贫困，提醒人们——妈妈是在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保持整洁。不然，她就无法生活下去。

在家里我只见到了妈妈和加莉娅。季马到格拉沃尔诺沃打靶场教预备役士兵射击去了。

在我没有见到妈妈的这两年里，她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面色发黄，但薄薄的嘴唇仍然紧紧闭着。似乎妈妈是想让周围的人明白，她永远不会对生活屈服，她终将作为一个胜利者摆脱一切伤脑筋的事情。

加莉娅却像往常一样，毫无目的的在屋里踱来踱去。由于近视，老是撞到椅子上，并且向我询问各种琐事——现在从基辅到莫斯科的车票是多少钱，各个车站上是不是还有搬运工人，还是把他们通通赶去作战了。

我这次前来，好像觉得妈妈的心情比以前平静些了。这是我没料到的。我无法理解，在这战争的日子里，当季马很快就可能被派赴前线的时候，妈妈的心情为什么会这样平静。但妈妈自己说出了她的想法。

“科斯季克，”她说，“现在我们轻松多了。季马当了准尉，是个军官，拿的薪水不低。现在我不担心明天没有钱缴房租了。”

她不安地看了看我，又补了一句：

“在战争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给打死的。我深信会让季马留在后方，上级很赏识他。”

我同意，在战争中的确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给打死。不能让她失去这一很靠不住的安慰。

看着妈妈，我懂得了，经常过着毫无保障的生活，这种痛苦意味着什么。懂得了，一个人是多么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安身之处和一块面包。但一想到，是她儿子冒着生命的危险才给家庭带来了这可怜的安定生活，而她竟为此感到幸福，我觉得很不是滋味。她不可能没意识到这种危险，她只不过是竭力不去想它罢了。

季马回来了——他晒黑了，十分自信。他解下刀柄镀金的崭新的军刀，把它挂在前室里。晚上，前室里开了电灯，这时刀柄金光闪闪，仿佛是妈妈简陋的住宅里唯一一件漂亮的物品。

妈妈已经告诉我，季马和玛尔加丽塔的婚事吹了。因为用妈妈的话来说，玛尔加丽塔原来是“一个非常让人讨厌的人”。我默不作声。

几天后，季马被派往纳瓦金步兵团。季马收拾行装，匆匆出发。他走得那么快，妈妈甚至都来不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只是在他走后的第二天，她才第一次痛哭了一场。

季马的梯队布良斯克车站备用线上上车。有风，是令人烦闷的一天——寻常的一天，空中飘着黄色的灰尘，天空显得很低。总是觉得，在这样的日子里不会发生任何特殊事情。

与季马告别的情况和这一天刚好相称。季马在指挥上车，他只是间或和我们说几句话，当军用列车已经启动的时候，才和我们匆匆告别。他追上自己的车厢，在列车运行中跳上踏板，但迎面驶来的列车立刻遮住了他。当两列火车错开以后，季马已经不见了。

季马走后，我从基辅大学转学到莫斯科大学。妈妈把季马住的那个房

间租给了莫斯科的电车工程师扎哈罗夫。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们这套住宅里，有什么东西能让扎哈罗夫觉得喜欢。

扎哈罗夫在比利时留过学，在布鲁塞尔住过许多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才回到俄国。这是个愉快的单身汉，留着剪短了的花白胡子。他穿着一套外国那种宽大的西装，戴一副引人注目的眼镜。扎哈罗夫在他屋里的桌子上堆满了书。但在这些书中，我几乎找不到一本技术书籍。大多是回忆录、长篇小说和《知识》杂志的合订本。

我在扎哈罗夫的桌子上第一次看到了法文版的维尔哈伦、梅特林克^①和罗登巴赫^②的作品。

那年夏天，大家都对比利时这个承受了德军第一次打击的小国表示钦佩，到处都在唱那首赞扬遭受围攻的列日市的保卫者的歌曲。

两三天之内，比利时就被完全击溃了。殉难的光环照耀着这个国家。它那些市政管理局和大教堂的哥特式建筑宛如美丽的花边，现在都已倒塌，在德国士兵的皮靴和大炮的铁轮下被碾成了灰尘。

我在看维尔哈伦、梅特林克、罗登巴赫的作品，力图在这些比利时人的书中找到他们同胞英勇精神的谜底。但无论是在维尔哈伦那些把旧世界看作伟大的邪恶而予以否定的复杂诗句中，在罗登巴赫那些犹如冰下的花朵——苍白而脆弱的小说里，还是在梅特林克仿佛于梦幻中写成的那些剧本里，我都没有找到这个谜底。

有一次，我在特韦尔林荫道上遇到了扎哈罗夫。他挽住我的胳膊，谈

① 莫里斯·梅特林克（1862—1949），法语剧作家、诗人。——译者

② 乔治·罗登巴赫（1855—1898），比利时法语作家。——译者